

中國意義上的「公共領域」，而另一方認為其並不符合「公共領域」概念的特點故不能套用。撇開概念論爭，近代商業精英群體的興起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商業精英的崛起是在國家體制鬆動的縫隙中成長。少部分因與政權發生互動而演變為國家資本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大多數則囿於已經不具備商業資本主義成長所需要的良性競爭市場空間而無法真正壯大。由此而引出的問題是，近代社會轉型中的地方商業精英是更需要一個自由市場的競爭環境，還是更需要一個威權政府的體制保護？

此外，儘管作者聲稱相對於第一部而言，本書「具體分析城市勞動

階級的所思所想及其行為」(頁2)，但作者把最終落腳點放在商業精英群體上，並未能真正從作為個體的城市底層勞動民眾的角度，分析其城市認同感、歸屬感之類的問題。

綜上所述，儘管此書仍存在可商榷之處，但作者着眼中西城市比較研究的大問題，用「事實上的公共領域」避開純概念辨析的誤區，引入城市心態史、社區研究等新興領域，以細密的實證分析為「公共領域」及其在近代中國的發展演變提供了又一個重量級個案，同時將漢口與歐洲早期城市相比較，挑戰了西方主流城市史觀，是城市史研究中的一部力作。

血與中國的傳統

● 張慧卿



余華：《許三觀賣血記》(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6)。

《許三觀賣血記》(引用只註頁碼)講述的是一個出身於農村的絲廠送繭工許三觀三十幾年的生活經歷，「血」與「賣血」是該書的主題。回鄉探親的許三觀偶然得知鄉人「賣血」的習俗後隨同前往醫院，並以賣血換取的三十五塊錢在城裏娶下了「油條西施」許玉蘭。在以後的幾十年中，每有家庭變故，許三觀就以賣血來挽救危機。直到三個兒子終於各自組建家庭後，他才恍然發覺歲月已奪去了他的健壯，「賣血救急」的「好時光」一去不返，對未來災禍的憂慮，使他在街頭痛哭起來。本文試圖從人類學親屬制度的視角出發對該書進行另類解讀。

小說中寫到，許三觀在七個不同的時期，為了七個不同的目的，

《許三觀賣血記》以「血」與「賣血」為主題。許三觀偶然得知鄉人「賣血」的習俗，在以後的幾十年中，每有家庭變故，他就以賣血來挽救危機。

「血」是生命維繫的象徵。一樂生病後，許三觀一路輾轉賣血。「血」又與性密切相關。小說中人物認為賣血的人在十天內不能有性生活，而賣血前的性生活簡直就是「不要命的行爲了」。

十二次賣血。第一次是許三觀在鄉間受到「血」和「賣血」的啟蒙教育後和阿方、根龍一起到城裏賣血。他用賣血的三十五塊錢迎娶了「油條西施」許玉蘭。第二次賣血則因為兒子一樂砸壞了方鐵匠兒子的頭，方鐵匠搬走了他所有的家當。他為了「贖回」這十年來好不容易積累的家當第二次賣血。第三次賣血是他剛和林芬芳偷情之後，在街上遇到進城賣血的阿方和根龍，這再次勾起了他對第一次賣血的回憶，為了對情人獻殷勤，他賣血為情人。

第四次賣血是在大饑荒的日子裏，在全家喝了五十七天的玉米稀粥之後，許三觀再次決定賣血，讓孩子吃上一頓好的飯菜。第五次與第六次是在上山下鄉的運動中，其時一樂和二樂都被發往鄉下，為了兩個兒子，他接連兩次賣血。第七次到第十一次是為了一樂的病，於是他沿途一路賣血去上海，一路連續賣了五次，差點兒賠上了自己的一條命。此後十一年過去了，年老的許三觀為了吃炒豬肝喝黃酒而去賣血，與前面那麼多次不同的是，這一次，他的血被拒收。

許三觀十二次賣血，在中國傳統的觀念中，「血」是甚麼，血與人的生命又有甚麼關係？

小說的開篇，許三觀的爺爺就問：「我兒，你也常去賣血？」「你沒有賣血，你還說身子骨結實？」（頁2）許三觀的四叔也說，沒有賣過血的人身子骨都不結實，「身子骨結實的人都去賣血，賣一次血能掙三十五塊錢呢，在地裏幹半年的活也就掙那麼多。這人身上的血就跟井裏的水一樣，你不去打水，這

井裏的水也不會多，你天天去打水，它也還是那麼多……」（頁5）許三觀關於「賣血」的啟蒙知識則是從鄉鄰根龍和阿方的身上學來的。許三觀和阿方、根龍賣完血後，阿方告訴他：「你把力氣賣掉了，所以你覺得沒有力氣了。我們賣掉的是力氣，你知道嗎？你們城裏人叫血，我們鄉下人叫力氣。力氣有兩種，一種是從血裏使出來的，還有一種是從肉裏使出來的，血裏的力氣比肉裏的力氣值錢多的。」（頁15）

第一次賣完血後，許三觀和根龍、阿方來到勝利飯店炒一盤豬肝、溫兩兩黃酒，阿方告訴許三觀，要補回血光靠吃飯沒有用，還需要用活血的豬肝和活血的黃酒補補才能恢復元氣。此後每次賣血，許三觀都會想到飯店裏吃上一盤豬肝和兩兩黃酒（第四次賣血時沒吃上）。不僅如此，他還將這個經驗傳授給賣血路上認識的搖櫓的來喜、來順兄弟。當來喜認為自己賣血的錢不多，捨不得吃豬肝的時候，許三觀一本正經地說：「來喜，這錢不能省，你賣掉的是血，不是汗珠子，要是汗珠子，喝兩碗水下去就補回來了，這血一定是要靠炒豬肝才能補回來的……這賣血和從女人身上下來還是不一樣的。」（頁247）

「血」是生命維繫的象徵。一樂生病後，許三觀一路輾轉賣血，「血」不再像「井水」般汨汨而流，他不僅賣掉了「身上的力氣」，而且在高頻度的賣血中，也將「剩下的熱氣也賣掉」。「血」又與性密切相關。第三次賣血後，阿方告訴許三觀：「吃一碗飯才只能生出幾滴血來，而一碗血只能變成幾顆種子，我們鄉

下人叫種子，李血頭（醫院裏管賣血的人）叫精子……」（頁98）因此，賣血的人在十天內不能有性生活，而賣血前的性生活簡直就是「不要命的行為了」。

「血」在中國的傳統親屬觀念中，更代表了血緣、血統，後代與前代的親屬關係靠血緣來認證。許三觀第二次賣血的時候，許玉蘭響亮地說：「血是祖宗傳下來的，做人可以賣油條、賣屋子、賣田地……就是不能賣血。就是賣身也不能賣血，賣身是賣自己，賣血就是賣祖宗。」（頁84）也基於「血」對兩代人之間的認證關係，一樂一度是刺在許三觀胸口的一根芒刺，一樂與他的父子關係多次發生變化。剛開始，許三觀愛護着他的三個兒子，尤其偏愛貼心懂事的一樂。當他得知一樂是妻子許玉蘭與初戀情人何小勇生的「野種」後，他對一樂的態度變了，他拒絕一樂享用他賣血得來的錢。這個場景在許三觀的第三次、第四次賣血時反覆出現。一樂是別人的野種，所以許三觀對一樂用他賣血的錢穿上新衣服感到彆扭，他對許玉蘭說：「一樂不是我的兒子，我養了他九年了，接下去還要養他好幾年，這些我都認了。我在絲廠送蠶繭掙來的汗錢花到一樂身上，我也願意了。我賣血掙來的血錢再花到他身上，我心裏就難受起來。」（頁106）

同樣地，當許三觀第四次賣血後帶妻兒到勝利飯店享用一元七角的麵條，享受生活的時候，也不包括一樂，一樂被他用五毛錢的紅薯打發了。兩年後，一樂的生父何小勇發生車禍，許三觀和兒子一樂完成「血統」上的認證、關係徹底變

化。何小勇車禍後，因需叫魂被迫承認一樂與他的親子關係，許三觀也在這次叫魂中勇敢劃破自己的臉，用「血」來確認他與一樂之間的父子關係。因此，一樂從血緣上並非許三觀的兒子，但在血統上取得了父子間的「合法地位」。

與「血」、「血統」密切相聯的是中國的繼嗣傳統。許玉蘭與她的父親血緣上雖親近，卻無法完成繼嗣的使命。為此，當許三觀對許父說：「你只有許玉蘭一個女兒，許玉蘭要是嫁給了何小勇，你家就斷後了，生出來的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得姓何。要是嫁給我，我本來就姓許，生下來的孩子也不管是男是女，都姓許，你們許家的香火也就接上了，說起來我娶了許玉蘭，其實我就和倒插門的女婿一樣。」（頁24）許父心動了，他說：「你說得對，我女兒要是嫁給了何小勇，我許家就斷後了。我女兒要是嫁給了你，我們兩個許家的香火都接上了。」（頁24）許許聯姻避免了中國繼嗣傳統的尷尬，許玉蘭為完成繼嗣的使命放棄了初戀情人何小勇。何小勇發生車禍後，一樂登上何小勇的屋頂為何小勇叫魂，更加強烈地表明了中國父系繼嗣的事實。在叫魂事件中，何小勇的妻子沒有叫魂的資格，他生養的女兒同樣也沒有叫魂的資格，唯一具有叫魂資格的是從來不被何小勇承認的兒子一樂。因為，一樂是男孩，只有男性直系親屬才具有叫魂的資格。

《許三觀賣血記》中許三觀的故事是中國千萬個賣血故事中的一個，他與其他當時所有的賣血者的觀念出奇地一致：血可以像井水一樣源源不絕、血是一種比汗還要強

「血」在中國的傳統親屬觀念中，代表了血緣、血統，與「血」、「血統」密切相聯的是中國的繼嗣傳統。從《許三觀賣血記》可以看出，中國始終是一個父系單線繼承的社會，與妻子和女兒無關。

的能量、血的補充需要花費比汗更多的錢，而且血是祖宗傳下來的，它只能用在血統、血緣一致關係的親屬上，與其他的非親生子女無

關。此外，從《許三觀賣血記》還可以看出中國慣有繼嗣傳統，它始終是一個父系單線繼承的社會，與妻子無涉，更與女兒無關。

中國天主教徒的兩難處境

● 吳 磊



《兩頭蛇》分析了多位十六、十七世紀皈依的中國天主教徒，他們一方面為中國傳統儒家士大夫，另一方面又是天主教徒，東西文明在倫理上的巨大反差，使得他們時常舉步維艱，迷失自我，陷入兩難境地。

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明末清初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熱絡期，而東西文明的碰撞，必然會對中國的思想領域產生重大衝擊。面對這種衝擊，中國的士人是如何應對的？尤其是明清之際中國奉教人士這個群體的心路歷程，對此學者鮮有研究。台灣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黃一農的力作《兩頭

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以下簡稱《兩頭蛇》，引用只註頁碼），以中國明清時期的第一代天主教徒為研究對象，彌補了這一學術缺憾。全書分析了多位十六、十七世紀皈依的中國天主教徒，這些人物一方面為中國傳統儒家士大夫，另一方面則又是天主教徒，東西文明在倫理上的巨大反差，使得他們時常舉步維艱，迷失自我，陷入兩難境地。此種兩難，是本書描述的重要內容。

作為一本教會史的著作，此書角度新穎。以前的研究，往往強調傳教士個體的得與失；近年來學者則更多地關注受傳者，用更宏觀的視野來看待中國教會史。然此趨勢雖成共識，但真正做到這點的著作，寥寥無幾。曾有學者聲稱，教會史的研究，範式轉移是必須的，可惜由於資料限制，特別是關於中國教友資料的缺乏，使得這種轉向很難做到。不過，看了《兩頭蛇》後，才知情況並非如此。直接的相關史料固然缺乏，但作者經過深入挖掘後，卻發現有許多可用的史料，深藏在明清的文集、筆記、傳記之中，各個家族、各個地區都可以聯繫起來，許多資料都可以互相驗證。